

苏轼的医疗活动

★ 张瑞贤 张卫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苏轼一生中 with 医药接触活动很多,加上他天生的好奇与乐善好施的性格,使他更有意地接触医药,参与了一些医疗活动。虽然他的医药活动不能与医家相比,但他起到的作用又是普通医家所不能比拟的。在宋代,正是由于苏轼等一批文人积极地支持医药事业,产生了儒医的阶层,提高了医生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关键词:苏轼;医学史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1 苏轼对医药的认识

古代医家与儒家的相通,首先是医家为了摆脱自己低微的地位,而后又有学者为了消遣、实际需要、道德要求等各种不同目的而接触医学。在宋代医儒相通表现得尤为突出的不是医者标榜为儒,而是儒者乐于习医、谈医,与医交往,甚至开展一些医疗活动。诚然,他们的医疗活动与医家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的参与改变了社会习俗,其能量是医家不可同日而语的。本文仅以宋代大文豪苏轼为例,粗浅探讨其在医学方面的一些活动,为进一步研究作准备。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州,自幼读书时就接触过有关医药的启蒙。据《苏轼文集·艾人着灸法》记载,幼时的苏轼就接触过艾灸方面的书籍(《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文集》,2349页)。其后苏轼还陆续读过一些中医书籍,如《别药性论》(记与欧公语)、《千金方》(圣散子叙)、《外台秘要》(服威灵仙法)(代茶饮子)、《伤寒(总病)论》(答庞安常二首)、《王氏博济方》(与东林广惠禅师二首)、《本草》注(夜烧松明火)等等,在《文集》中多次提到《本草》一书。

苏轼还让自己多病的次子苏迨也学医。“次子病学医,三折乃粗晓。”^[1]

在对医学的认识上,苏轼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其他文人通常的作法不同,他在延请医家诊治疾病时,他常将自己的症状和盘托出,以便医者诊断辨证。他认为疾病千变万化,而诊断却又微妙难明:“脉之难明,古今所病也。至虚有盛候,而大实有羸状。差之毫厘疑似之间,便有死生福祸之异。此古今所病也。”世上优秀的医家非常少,病家应有自己的办法:“病不可不谒医,而医之难明脉者,天下盖一、二数。骥驥不时有,天下未尝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终不徒死,亦因其长而获其短耳。”有些文人为了考验医家的水准,常隐瞒症状而试医,苏轼对此很不赞同。“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诊,以验医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虚实冷热于疑似之间。

医不幸而失,终不肯自谓失也,则巧饰遂非以全其名、致于不救,则曰是固难治也。间有谨愿者,虽或因主人之言,亦复参以所见,两存而杂治,以故药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苏轼的作法是全心相信医家,因此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吾平生求医,盖丁平时默验其工拙,至于有疾而求疗,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文集·东坡诊脉》2341页)

对于医药界的有些怪异迷信的东西,苏轼也极尽讽刺。在熙宁间,他曾拜谒欧阳修,陪同欧阳修游西湖,在谈到某些医家“以意用药”时大加鞭笞。

欧阳修谈到:有人患病,医家问知病因为“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家便取常被舵工手汗渍染的多年舵牙,刮下末来,掺杂丹砂伏神等中药,饮之而愈。因此他说:“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以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苏轼不直接驳斥这种荒诞不经的做法,而是采用了归谬法说,以此类推,“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而广之,则饮伯夷之鬻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馐余,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文集·医者以意用药》2342页)

医学分科的成熟大致开始于宋代,对此苏轼有不同的意见。至今我们又在大力培养全科医生,也可见苏轼的先见之明了。“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文集·跋君谟飞白》2181页)

在苏轼从政的坎坷经历中有许多奏章,在奏章中苏轼也常以医喻政。“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

(《文集·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1012 页)“臣又闻陛下以为此法且可试之三路。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以毒药乎!”(《文集·再上皇帝书》748 页)“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覬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文集·朝辞赴定州论事状》1020 页)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2 苏轼爱好搜集秘方,广泛施方舍药

2.1 广泛搜集秘方

同现在的有些文人一样,苏轼喜爱搜集民间单方,尤其是秘方。由于苏轼的特殊身份和宦游经历,他的医方来源广泛。在佚名《苏沈内翰良方序》中论述了苏轼的医药抱负:“盖坡老仕宋颇得言谴,而放逐危难者屡焉。其以刚亮锐直之资,动里省躬之际,乃正其所也。陆贽不用,阖门修方书之意,犹乎此……若医术一事,滞者使之通,卧者使之起,瘠者使之充,昏者使之爽,秘者使之开。忧子者泰父母反侧之心;痛夫者开妻妾颦蹙之思。鬼门转其足,生宅复其魂,推广仁民之道,端在于是。此坡老之隐抱。”^[1]

2.1.1 得自内庭 苏轼由于“工作”的关系,偶尔能接触到宫廷秘方,他会有心地记载下来。据《文集·裕陵偏头痛方》,“裕陵传王荆公偏头痛方,云是禁中秘方……虽数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与仆言之,已愈数人矣。”(《文集》2345 页)王安石曾把神宗所传偏头痛方,传给苏轼。《墨庄漫录》叙述较详:“王文公安石为相日,奏事殿中,忽觉偏头痛不可忍,遂奏上请归治疾,裕陵令且在中书偃卧。已而小黄门持一小金杯,药少许,赐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并灌之。’即时痛愈。明日,入谢,上曰:‘禁中白太祖时,有此数十方,不传人间,此其一也。’因并赐此方。苏轼自黄州归,过金陵,安石传其方,用之入神。但自目赤少时,头痛即愈。法用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使人滴入鼻窍。”^[2]

2.1.2 得自僧道 苏轼的朋友中,不少是和尚道士。僧道在传播教义的同时常有医药活动。苏轼也常从他们那里得到医方。《服生姜法》记载了熙宁年间苏轼在杭州时得服生姜法的经历和服生姜的详细方法:“予昔郡钱塘,游净慈寺,众中游僧号聪药王,年八十余,颜如渥丹,目光炯然。问起所能,盖诊脉知吉凶如智缘者。自言服生姜四十年,故不老云。姜能健脾温肾,活血益气。其法取生姜之无筋滓者,然不用子姜,错之,并皮裂,取汁贮器中。久之,澄去其上黄而清者,取其霞白而浓者阴干刮取,如面,谓之姜乳。以蒸饼或饭搜和丸如桐子,以酒或盐米汤吞数十粒,或取末置酒食茶饮中食之,皆可,聪云:山僧孤贫,无力治此,正尔和皮嚼烂,以温水咽之耳。初固辣,稍久则否,今但觉甘美而已。”(《文集》2346 页)

《服威灵仙法》介绍了两种服法,其中一种来自“牢山一

僧”,该僧人因为服此,“年百余岁,上下山如飞”。具体方法是:“取此药(威灵仙)粗细得中者,寸截之七十,予作一贴。每岁作三百六十贴。置床头。五更初,面东,细嚼一贴,候津液满口,咽下。”(《文集》2347 页)

《养生诀》云:“近年颇留意养生。读书、延问方士多矣,其法百数,择其简易可行者,间或为之,辄有奇验。”(《文集》2335 页)

元丰间,在黄州,尝与黄冈县令周孝孙交往。《徐问真从欧阳公游》记述从欧阳修处得徐问真道士的治足疾之诀,以下云:“予贬黄州,而黄冈县令周孝孙累得重腿病,某以问真口诀授之,七日而愈。”(《文集》2318 页)

2.1.3 得自民间 苏轼宦游各地都非常留意当地的医药,即使在贬谪边远之地也不例外。在海南时,他曾发现民间使用一种叫“倒粘子”的草药治疗“夏秋痢下”,于是亲自采来经过炮制,制成丸剂,治疗自己的“小便白胶”、“大腑滑”,皆平复痊愈。“吾谪居海南,以五月出陆至藤州,自藤至儋,野花夹道,如芍药而小,红鲜可爱,朴椒丛生。土人云:‘倒粘子花也。’至儋则已……童儿食之,或大便难通。叶皆白,如白蠟状。野人夏秋痢下,食叶辄已……吾久苦小便白胶,近又大腑滑,百药不差。取倒粘子嫩叶酒蒸之,焙燥为末,以酢糊丸,日吞百余,二腑皆平复,然后知其奇。药业因名之曰海漆,而私记之,以贻好事君子。明年子熟,当取子研滤,酒煮为膏以剂之,不复用糊矣。”(《文集·海漆录》,2357 页)

2.1.4 得自同僚好友 同僚中无论上下,苏轼多能友好相处。在他们患病期间治疗的秘方也成为苏轼索取的对象。《治暴下方》云:“欧阳文忠公常得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药,三文一贴,甚效。’公曰:‘吾辈脏腑,与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国医药杂进之,一服而愈。公召卖者厚遗之,求其方,久之,乃肯传。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下二钱匕,云:‘此药利水道而不动气,水道利则清浊分,谷脏自止矣。’”(《文集》2361 页)

圣散子是巢元修的祖传秘方,元丰年间苏东坡谪居黄州,故人巢元修赶到黄州来,无意间透露了他藏有圣散子方,苏轼苦磨硬泡,甚至不惜发誓,非要得到此方而后快。“其方不知所从出,而故人巢君谷世宝之,以治此疾,百不失一……巢甚秘此方,指松江水为誓盟,不得传人。”^[2]

2.1.5 得自亲戚乡里 《服威灵仙法》中还介绍了一种得自“眉山一亲知”的方法。该“亲知”“患脚气至重,依此,服半年,遂永除。”具体方法是将威灵仙“净洗阴干,捣罗为末,酒浸牛膝末,或蜜丸,或为散酒。调牛膝之多少,视脏腑之虚实而增减之。”(《文集》2347 页)

2.1.6 得自医家 从医家处得到医方更是经常的事情。庞安时就曾将自己编写的各种医书送给苏轼阅览。苏轼也还从不同医家处索取稀奇古怪的医方。如《服绢法》载:“医博张君传服绢方,真神仙上药也。”(《文集》2352 页)

与医家的交往中,不仅从医家处索取医方,还向医家请教医方的问题。宋哲宗元祐元年,曾就四神丹的问题请教过名医康师孟。《四神丹说》介绍了四神丹的处方、用法、来源,以及请教名医康师孟的情况和后来的影响。“熟地黄、玄参、

当归、羌活。各等分。右捣为末,蜜和丸,梧桐子大,空心酒服,丸数随宜。《列仙传》:‘有山图者,入山采药,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服,遂度世。’顷余以问名医康师孟,大异之,云:‘医家用此多矣,然未有专用此四物如此方者。’师孟遂名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争饵之,百疾皆愈,药性中和,可常服。大略补虚益血,治风气,亦可名草还丹。”(《文集》2360页)

2.1.7 得自书本 作为大文豪的苏轼一生中阅尽群书,他的“八面受敌”读书法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出于对医方的爱好,他也常将书本中看到的医方记录下来备用。《宪宗姜茶汤》:“宪宗赐马总治泄痢腹痛方,以生姜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钱,并草茶相等,煎服。元祐二年,文潞公得此疾,百药不效,而余传此方,得愈。”(《文集》2344页)

《代茶饮子》云:“王焘集《外台秘要》,有《代茶饮子》一首云……余尝依法治服,其离隔调中,信如所云。”(《文集》2351页)

2.2 广泛传播医方

苏轼得到的医方绝大多数是为了送给别人解救疾苦,在这方面他是没有功利,纯粹是“助人为乐”的。

2.2.1 帮助亲友同僚 元丰七年,苏轼在黄州时听说苏颂坠马受伤,马上找出家传秘方,匆匆差人送去。在给苏颂的信中写道“适见人言,宗叔坠马,寻遣人候问门下,又知有少损,不胜忧悬,又不敢便上谒。家传接骨丹,极有神验,若未欲饮食,且用外帖,立能止痛、生肌、正骨也。匆匆奉启,不宣。”(《文集·与苏子容四首之二》2480页)后来又介绍庞安时为其诊治,“公所苦,想亦不深,但庸医不识,故用药不应耳。薪水人庞安时者,脉药皆精,博学多识,已试之验,不减古人。度其艺,未可邀致,然详录得疾之因,进退之候,见今形状,使之评论处方,亦十得五六。可遣人与书,庶几有益。此人操行高雅,不志于利,某颇与之熟,已与书令候公书至,即为详处也。更乞裁之,仍恕造次。”(《文集·与苏子容四首之三》,2480页)

在元祐二年与袁彦方简,不但详细告知治疾方,而且还不厌其烦地把药物真伪的鉴别经验告诉对方。“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威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但威灵仙难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薰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鸱鹗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加减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槐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文集·与袁彦方一首》1850页)

松脂被认为是养生的药物,苏轼家传有服松脂法,他曾写信将此法传给米芾:“松脂以真定者为良。细布袋盛清水为沸汤煮,浮水面者,以新篲簾掠置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制,但削去皮,捣罗拌匀,每日早取三钱匕着口中。用少熟水搅漱,仍以脂如常法揩齿。毕,

更啜少熟水咽之,仍漱吐如法。能坚半齿、驻颜、乌髭也。”(《文集》2353页)

类似的书札在苏轼的信函中还有很多。

不仅是朋友,在苏轼的眼中根本没有仇人。曾经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的小人章惇,苏轼也根本不记恩怨,还赠送自己的药方。在致章惇之子致平的信札中,可以充分展现出苏轼的宽阔如海的胸怀,对于将要贬置海隅的章惇他除介绍各种生活的注意事项外,还带病特地抄录了自己《续养生论》和白术方,介绍的极为详尽缜密:“白术一味,舒州买者,每两二百足,细碎而有两丝,舒人亦珍之。然其膏润肥厚,远不及宣、湖所出,每裹二斤,五六百足,极肥美,当用此耳。若世所谓苍术,不可用。细捣为末,余筋滓难捣者弃之。或留作香,其细末曝日中,时以井花水洒润之,则膏液自上,谨视其和合,即入木臼杵数千下,便丸,如梧桐子大。不入一物。此必是仙方。日以井花水咽百丸,渐加至三百丸,益多尤佳。此非有仙骨者不传。”(《文集·与章致平二首之二》1645页)

2.2.2 广泛施与民众 元祐五年三月,杭州发生疫情,苏轼施圣散子方,以解救疾苦。

《圣散了后序》:“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罗尊者,以诃梨勒施一病比丘,故获报身,身常无众疾,施无多寡,随力助缘。疾病必相扶持。功德岂有限量,仁者侧隐,当崇善因。吴郡陆广秀才,施此方并药,得之于智藏主禅月大师宝泽,乃乡僧也。其陆广见在京施方并药,在麦曲巷居住。”(《文集》332页)苏轼以积功德的方式号召佛教信众“随力助缘”,组织信士在寺院制药,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仁宗皇祐三年曾诏太医編集《简要济众方》5卷,颁行天下郡县。时隔十余年后,刚刚走上仕途在凤翔县任职的苏轼看到“穷远之民,或莫闻知”。于是又重新将方书公布于当地,“书以方板,揭之通会。不独流传民间,痊痾愈疾,亦欲人人知上恩也。”(《文集·书济众方后》2066页)

到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已经进入暮年的苏轼在虔州时仍然不忘布施方药于人。《春渚纪闻·馈药染翰》:“先生自海外还至赣上,寓居水南日,过郡城携一药囊,遇有疾者,必为发药,并疏方示之。”^[3]有人问苏轼为什么要广蓄药物施与他人,他回答是看到别人得到治疗就感觉自己也神清气爽了。《林下清录》记载:“或谓东坡曰:‘子无病耳多蓄药,不饮而多置酒,劳己以为人,何也?’坡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专以自为也。’”^[1]

3 苏轼宣传医学,反对迷信,倡导建立公共卫生设施

3.1 宣传医学,反对迷信

在当时社会标准下,苏轼是非常痛恨迷信,提倡“科学”的。

元符三年(1100)在海南时,他看到当地人信巫不信医,杀牛祭鬼的现象十分痛心。他在《书柳子厚牛赋后》中写道,

当地“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无权无职的苏轼看到愚昧的百姓和无辜的耕牛痛心无比，他悲哀自己“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贇，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文集》2058 页）寄希望于宗教人士能帮助纠正民俗，治病救人。

《牛赋》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所作。柳宗元自比作牛，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做了许多有利于天下的事，却得不到好报。苏轼书写《牛赋》却是借用柳宗元对于耕牛的赞美，谴责有病不求医却滥杀牛的恶习。“牛之为物，魁形巨首……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不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

嘉祐七年，苏轼在凤翔任上，看到缺医少药的状况，便把 12 年前朝廷颁布的太医院使周应编集的《简要济众方》5 卷，重新“书以方板，揭之通会”。以供民间遇有病患抄录使用。（《文集·书济众方后》2066 页）

更多的时候苏轼是自己将医书中的有关章节抄录出来送给他人。

绍圣二年（1095）秋，法芝（县秀）来惠州，苏轼专门录孙真人《千金方》数纸赠之：“右并于孙真人《千金方》录出。今于孙相去百四十余年，陵谷迁易，未必一一如其言，然犹庶几可寻其仿佛。俗士扰扰，岂复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犹得者自服之耳，岂复能见饷哉！今因县秀归南，寻录此数纸，恐山中有能哀东坡之流落又不忍独不死者，或能为致之。果尔，便以此赠之耳。”（《文集·书诸药法》2353 页）转托县秀以赐诸药法转赠旧友，一是以书法传播方药，二是求故旧以药惠寄。魏了翁曾见到苏轼所书《千金方》“书诸药法”。《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墨林方氏帖·苏文忠公·书千金方帖》：“仙者葛洪、孙思邈著有方书传世。《抱朴子》方最多，世未有试之者。若《千金方》，则试而验者多矣。坡公于其中录出此方，岂以其言高虚似《抱朴子》者。辄恨吾老矣，不能以身试方，当俟诸识者。”^[4]周必大也曾见过苏轼的医药书法，并以此将其比作唐代名臣陆贽。《省斋文稿》卷十八《题苏季真家所藏东坡墨迹》：“陆宣公为忠州别架，避谤不著书，又以地多瘴疠，抄集验方五十卷，寓爱人利物之心。文忠苏公手书药法，亦在琼州别架时，其用意一也。”^[3]

不仅书于纸上送人，苏轼还喜将医方题于墙壁，供人抄录。元符元年（1099）三月，苏轼尝离开元寺。书张耒（文潜）论治眼、治齿语于琼州开元寺壁。《晚香堂苏帖》：“眼恶点濯，齿便漱琢。治眼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当如商鞅之治秦。此张文潜之言也，而予喜书之。戊寅三月廿二日题开元寺壁。”^[5]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论治眼、治齿语也见于《目忌点濯说》，云：“前日，与欧阳叔弼、晁无咎、张文潜同在戒坛。余病目昏，数以热水洗之。文潜曰：‘目忌点濯，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不可同也。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兵当如商鞅之治秦。’此颇有理，退而记之。”（《文集》

2343 页）

3.2 病坊、安济坊等的设立

我国平民的医院出现很早，南北朝时期，已有政府开办的“医院”，为穷苦病人治疗。南齐有“六疾馆”等，北魏有“医馆”。此后唐代又有“悲田养病坊”，由僧徒掌管。宋代由政府开办的类似医院的病坊、安济坊逐渐多了起来。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七月“初置养病院”^[5]。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苏舜卿上奏请求“依有唐故事，初置悲田养病坊。州郡并以曹官领之，仍于高年择信行可称者三、两人与僧官同切管勾……”^[6]

北宋大文豪苏轼知杭州，因见杭州人民蒙受疾疫多于他处，哀集羡银，复发私橐，于元祐五年（1090）建立“病坊”，由僧人掌管，名“安乐坊”。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记载：“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哀集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9]周焯《清波别志》也记载了此事：“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改为安济坊。”^[7]

崇宁二年（1103）安乐坊由政府接管，易名“安济坊”。宋徽宗时期在全国各地修建不少病坊。据施谔《淳祐临安志》载：“崇宁三年（1104）（宋徽宗）降指挥，置居养院、安济坊，以示朝廷惠养元元之意。”文后作者案语中记载：“苏公轼与某宣德书：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赈仪，自黄迁汝，亦蒙公厚饷。当时，邻于寒殍，尚且辞避。今忝近臣，尚有余沥，未即枯竭，岂可冒受？又恐数逆盛意，非朋友之义，辄已移杭州作公，意舍之病坊，此旧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伦理，岁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赀，故用助头田以养天民之穷苦，此公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资公之福寿，某亦与有荣焉。想必不讶。至于感佩之意，与收之囊中无异也。详此则杭州病坊始置于东坡，整备如此。而旧失于传，故特附载于此。”^[8]

3.3 请求为病囚医疗

史书记载五代时，各地常不依法审判，非法拷掠，打死以后病死中报。后唐长兴二年开始设“病囚院”。唐代，有病的囚犯发给药品并开械，准许囚徒家属进监侍候病囚。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其中对于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都制定了措施。狱囚有疾病，给医药救济；重病者脱去枷，允许家内 1 人入禁看待。诸道州府各置病囚院。或有病囚，即时差人诊候治疗，病痊后，据所犯轻、重决断。

元丰二年（1079）苏轼也曾奏请医疗病囚，提出专医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落实医疗费用，奖励有成绩之医疗人员。《乞医疗病囚状》指出：“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无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责者。苟以时言上，检视无他，故虽累百人不坐。其饮食失时，药不当病而死者，何可胜数？若本罪应死，犹不足深哀，其以轻罪系而死者，与杀之何异？”于是根据《周礼·医师》的考核制度，提议“臣愚欲乞军巡院及

天下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人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为界。量本州县囚系多少,立定佣钱,以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充,仍于三分中先给其一,俟界满比较,除罪人拒捕及斗致死不计外,每十人失一以上为上等,失二为中等,失三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从。其上中等医人界满,愿再管勾者听。人给历子以书等第。若医博士助教有阙,则比较累岁等第最优者补充。如此,则人人用心,若疗治其家人,缘此得活者必众。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宽剩役钱与坊场钱,所在山积,其费甚微,而可以全活无辜之人,至不可胜数,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者矣。”(《文集》763页)

苏轼一生中与医药接触活动很多,加上他天生的好奇与乐善好施的性格,使他更有意地接触医药,参与了一些医疗活动。虽然他的医药活动不能与医家相比,但他起到的作用又是普通医家所不能比拟的。在宋代正是由于苏轼等一批文人积极地支持医药事业,产生了儒医的阶层,提高了医生在社会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后集卷七.将至广州用过韵寄迈迨二子[M].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6.532
- [2](宋)沈括、苏轼撰,杨俊杰、王振国点校.苏沈良方[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
- [3](宋)陈邦基.墨庄漫录卷五[M].见:四库从刊三编子·子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4]沈括,苏轼撰,杨俊杰等点校.苏沈良方[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21
- [5](宋)遵春渚纪闻·卷六[M].见:四库全书子部一六九杂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36
- [6](明)沈仕.林下清录[M].见:古今说部丛书.上海:国学扶轮社,1913.2
- [7](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文集[M].见:四库从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70
- [8](宋)周必大.省斋文稿[M].见:庐陵州益国文忠公文集.1899,8~9
- [9](明)陈继儒辑刻.晚香堂苏帖[M].北京:中国书店,1990
-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M].见:四库全书史部七十二三编年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15
- [11](宋)苏舜卿.苏学士集·卷十五事[M].见:四库从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5
- [12](宋)苏辙.栎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M].见:四库从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3
- [13](宋)周焯.清波别志[M].清乾隆至道光间长塘鲍氏重印本《知不足斋丛书》第四十八集清波二志
- [14](宋)施谔.淳祐临安志[M].见:《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编,1990.3 290

(收稿日期:2005-07-13)